

边疆考古学与民族史研究论丛

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

郑君雷 著



科学出版社

边疆考古学与民族史研究论丛

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

郑君雷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 / 郑君雷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3

(边疆考古学与民族史研究论丛)

ISBN 978-7-03-050812-6

I. ①边… II. ①郑… III. ①边疆考古—中国—文集 ②民族历史—中国—文集 IV. ①K872-53 ②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88681号

责任编辑: 赵 越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美光设计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1 1/2

字数: 500 000

定价: 18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郑君雷在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本科毕业后，先是师从魏存成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主攻鲜卑考古；后在1993年成为我的博士研究生，主攻东北战国至秦汉时期考古。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指导他做类型学研究，他写成了《战国时期燕墓陶器的初步分析》，后来被《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刊用。在做毕业论文“中国东北地区汉墓研究”时，我让他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日本人早年在朝鲜境内发掘的汉墓的材料，对他认识东北汉墓确实深入了一步，在论文答辩时得到答辩委员们一致肯定，答辩委员会主席刘庆柱先生曾建议将论文分为上、下两篇，投寄《考古学报》。后来，刘先生主编的《中国考古学·秦汉编》中，“东北地区汉墓发现与研究述要”就是由郑君雷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作的。

郑君雷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除了继续研究东北地区战国秦汉考古和鲜卑考古外，从2001年起参加了我主持的“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这个科研项目的一个子项目，因为他此前已经翻译诺曼·哈蒙德的《寻找玛雅文明》一书，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相当好的英文底子，所以请他综合研究英文文献中对游牧文化的界定和游牧文化起源的诸家观点，在他2002年调到中山大学任教后，继续完成这一工作。所以，他在参加工作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以上三个研究方向上的成果，直到现在都没有放弃在这些方向上的努力。

在他到中山大学任教之后，我很欣喜地看到，他在从北国到南疆的大环境改变后，能够相当快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提高研究能力为基础，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研究西汉时期中国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问题。进行这样的研究，他的视野便从东北地区和北方长城地带扩展到长城地带更西的“西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地区，而且以中山大学实际从事田野工作的峡江地区为基点，向西南一直扩展到云贵高原，向南面扩展到岭南地区并兼及了古越族广泛分布的东南沿海地区，甚至注意到了“红河交通道”这一通向今天中国国境之外地区的古代文化通道。在很广阔的地域内，研究了不同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汉文化形成的不同模式。当然，以一人之力在短期内形成系统的见解，肯定是粗浅的，可以引起许多争议的。但是，我认为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是一个可以引领风气并值得他自己毕生为之努力的重大方向。因为从秦代开始直到东汉的400多年间，中国有很大一片地域处于统一的政权管理之下，现代中国主体民族——汉族便是大体上分布在这个地域中的。这片地域中的居民在文化上如何逐步一体化，便是今天的汉族形成，以及中华民族各族与汉族不断一体化的重要历史基础之一。

回想 20 世纪 50 年代初，苏联史学家叶菲莫夫发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模式，认为汉族形成于 19~20 世纪之间，范文澜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认为汉族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当时，“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那时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主要运用文献史料来进行的。后来，中国田野考古逐步开展，到 20 世纪末，俞伟超先生从考古学上提出了“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他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视为人们共同体一切活动的综合体，这种共同体历经血缘纽带到地缘纽带的变化，考古学文化的形成途径及其文化的组成成分和内容，亦因而发生相应变化。两汉时汉文化的出现，反映了秦代以前的众多族群，在血缘关系、语言、文化（特别是信仰）、主观认同等方面不断融合，这样形成的族群又不断融入新的成分而不断扩大，“即是后代所谓的以汉人、汉族为称，一直继续到现在”。当然，从族群的观点来看，汉代这种人群集团只是自称为“中国人”，而边疆异族人群则开始其为“汉人”。直到元忽必烈时期，“汉人”还仅指灭金时金国的居民（其中包括契丹、渤海、女真、高丽等），而把南宋境内的居民另称为“南人”。所以现代的“汉族”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不断扩大内涵的。汉代实际上只是形成了它的核心部分。而汉文化的研究反映出这种汉族历史核心形成的情形。

当然，要研究这样大的一个问题，单单以一人之力，恐怕即便是用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难以完成的。然而，按今天流行的办法，组织一个大的团队，按地域分成多少个课题组，分工合作来做，往往会变成平铺直叙的一大堆材料的组合，缺少一个有独到之见的灵魂。所以，郑君雷有勇气把西汉前期的汉文化统一划分成几个区域，总结每个区域的特点，虽然难免粗浅，却提出了一种系统的独到的见解。如果有志于也参加这一重要题目的研究的人员，就并不会是对某个区域、某个特点再做细化或修改、补充，而可以在总体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质疑，激发出更多、更新的独特创见，才能使我们对汉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认识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就郑君雷本人来说，要做这样大的题目，自然不能局限于考古学这一种研究手段，所以在他的这部论文集中，可以看到他对与考古学相关的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文献学等多方面知识的钻研和把握，在和他同时代的考古学者中，他的勤奋好学、不断充实自己是很有值得称道的。

我对这部论文集中最感兴趣的一篇文章，是《〈中国东北地区汉墓研究〉旧稿检讨》。

我觉得，因为考古学研究中新材料层出不穷的特点，每个从事这种研究的人，总是需要根据不断发现的新材料来检验自己做过的研究是否正确，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如果一定要以为有人能高明到发表的论文结论一点都不能改，才算是大师，那是完全不符合实践论观点的。郑君雷能够不断注意新发表的材料，检查自己过去的研究结论有哪些是正确的，应该坚持的，哪些是需要修正、补充的，这才是考古研究应有的态度。我自己在研究东北系青铜剑时，就曾执着于类型学演变的一个特征，得出这种剑

起源于辽东的结论。但见到更多的新发表材料后，在《中国东北系铜剑再论》一文中便修正为起源于辽西了。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要重印《林沄学术文集》，我打算对过去的文章也做一番检讨，用按语把发现错了的地方指出来，以免继续误导读者。借此机会申明：郑君雷的论文中有一处是我造成的错误，关于战国燕墓陶器的排队。我当时仅从发表的几件陶匱排队出发，引申出全部陶器的序列。现在看来，还是陈光掌握了更多的燕国陶器，所排的队更正确（《东周燕文化分期论》载《北京文博》1997年4期、1998年1、2期）。当然《战国时期燕墓陶器的初步分析》一文也仍有可取之处，读者当可在比较中择善而从。

深望郑君雷在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上，不骄不躁，攀登不息！

林 沄

2018年2月25日于长春剑桥园

目 录

概 论 编

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	1
论“西汉墓幽州分布区”·····	6
关于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及其相关问题	
——以夏至战国时期和汉代北方长城地带为中心·····	16
“游牧性质遗存判定标准”的一些图示和一点补充·····	51
东部鲜卑“名实”与鲜卑考古学的族属研究·····	64
嫩江平原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界	
——兼析“长城地带”“北方文化带”等学术概念·····	72

东北边疆编

《中国东北地区汉墓研究》旧稿检讨·····	83
东北郡县以外地区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13
辽阳汉魏图画小识三则·····	128
辽宁锦县昌盛石椁墓与辽东属国·····	134
关于渤海国的“高丽”标识·····	140
“东北文化区”意义上的燕云地区辽墓·····	143

北方边疆编

北方草原地区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52
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文化因素分析·····	166
林西井沟子的早期游牧遗存及其他	
——《林西井沟子——晚期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与综合研究》读后·····	174
在把握乌桓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上探寻其遗存	
——读《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札记·····	184

鄂尔多斯高原战国秦汉时代族群地理·····	194
上孙家寨墓地——河湟谷地汉文化形成发展的缩影·····	202

西南边疆编

巴蜀“船棺葬”——船棺的界定、类型及文化内涵·····	215
峡江地区汉晋南朝花纹砖上的车轮纹饰·····	226
战国秦汉时期“红河交通道”的考古学背景·····	238

南方边疆编

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	251
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	269
南越国“西于王”事迹钩沉·····	276
也说“瓯骆联盟”和“瓯骆国”·····	284
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轨迹的解析 ——兼论江浙地区汉文化形成发展的“共生类型”·····	293

其他编

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	301
北方草原造型艺术研究的开篇 ——读《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	313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中的“航线遗存”·····	317
北魏洛阳外郭城复原研究的初步检讨·····	325
后记·····	333

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

“汉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上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文化研究和文明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课题承载内涵之丰富厚重，以及涉及领域之宽广宏阔，实在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这里只是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对于“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研究”的几点初步认识。

“汉文化”与“汉文化的形成”

在“汉文化的形成”研究领域，考古学材料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地不爱宝，新发现层出不穷，大量的新材料还有可能引发知识体系的更新，考古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分量还会加大。就谨慎的考古学者而言，一是对于“汉文化”的概念和“形成”的标志理解不统一，二是对于运用考古学材料直接探讨汉文化形成的有效性抱有疑虑，因此其注意力和相关成果仍然集中在考古学意义上的资料分析和研究方面，多数人并不愿意付诸笔墨去直接讨论这类容易流于空泛的话题。不过考古学者对于“汉文化形成”的关注和思考却是一直存在的。

考古学者的一般思路，是认为“汉族的形成”与“汉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视为汉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在考古学上，或许可以将各地尤其是边远地区汉墓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最终趋于一致与汉民族的基本形成相联系。这一过程的完成，一般是在武帝以后。解释这一过程，将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与西汉中晚期两个阶段的墓葬材料加以对比很能说明问题。

这一思路在技术层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此容易为一般学者所接受。但是进入学理层面，难免有人会追问，“能否界定出秦汉的汉族”、“什么是汉文化”、“如何看待边远地区汉文化的特殊性及其考古学表现”这一类问题。而且，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是否基本一致？若不一致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民族学和考古学上的基础问题未必有定论，经常是各执己见——越讨论越糊涂。尤其是置放在西汉帝国开疆拓土的宏大空间场域、历史背景和历史进程中，这样考虑问题有些简单化。

在有些历史学者看来，汉文化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即：“以汉字为载体，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以汉朝为标志”^①，这一概念是否精到当然可以讨论，但是较为丰满。在考

^① 陈玉龙、杨通方、夏应元等：《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古学操作层面,至少可以牵连出汉代疆域范围、汉代纪年范围、汉城、汉式墓葬制度(葬俗、葬式、棺槨和随葬器物)、汉式器物、汉陶、汉字(碑刻、铭文、印章、封泥、榜题)等一串相对客观的标准,关联性更强,观察点更多。但是本质上仍然不能完全回答类似的诘问。

文化其实是联结世界的途径。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意味着边远地区与西汉帝国成为一体,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密不可分、相互依赖。意味着边远地区已经建立起西汉帝国主导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西汉政府对边远地区的有效管理。这些内容,都可以放在“统一”的维度上来考量。葛剑雄先生认为,“统一的主要标准应当是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而不能仅仅根据制度上的相似和文化上的类同。”^①在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的研究中,这种考量相对超脱出物质文化的束缚,提供出更广阔的思考空间。也可以说,在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就是对当地前期政治体系的整体否定。还应该认识到,汉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汉文化因素的构成情况会有许多阐释空间。

“汉文化形成研究”的研究视野

在这样的认识体系中研究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考古学操作层面的着眼点并不拘泥于考古学文化中汉文化因素的绝对数量,以及前期的考古学文化体系是否被整体性地颠覆和替代。还需要考察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以及诸边远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也不必然是选取西汉武帝的时间截面。依据这些认识,我们将西汉边远地区划分为西北朝鲜、辽西辽东、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河西走廊和河湟谷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岭南和东南沿海八个区域,从考古人类学上分别讨论各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

将此八个地区串连成一个整体的“华夏边缘”,是为了更加清晰地观察“汉文化形成”的整体格局和历史过程。苏秉琦先生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②,这种史前和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格局深远地影响着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由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中原区六大板块和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三大走廊组成,板块是以走廊相联结的^③。考古学上的“区系类型”学说和民族学上的“民族走廊”理论强调的都是整体格局,对于全面完整地认识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有着深刻启发。

①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85~94页。

②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③ 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

我们以为,这八个西汉边远地区,实际上能够串连为“辽海走廊”、“北方长城地带”、“藏彝走廊”和“珠江地带”四条考古学文化地带或族群通道。而考古学文化地带的概念,在学术史层面可以追溯至童恩正先生提出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①以及佟柱臣先生提出的“阴山”和“南岭——武夷山”两条新石器文化接触地带^②。

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有可能大为开拓考古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深度,但是在中国范围内,多是停留在理念的讨论上,比较成功的个案研究仍然罕见。另一方面,虽然考古学也被许多学者视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但是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具体发展情况,事实上与人类学渐行渐远,这种局面其实也影响到历史维度对人类学研究的纵深支撑。“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研究,是考古人类学的极好实践。王明珂先生认为,华夏认同与中国边界的形成具有生态资源背景;华夏认同一旦产生,就大量吸附边缘人群,直至生态边界的极限地区;华夏边缘最终在汉代得以形成与保持^③。林耀华先生的“经济文化类型”体系强调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向,强调经济文化类型决定着族群的文化特征,并且充分考虑到经济文化类型与历史进程的关系^④。这些认识,对于考古学者进行“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研究”有着很好的启迪。中国的边疆在更广阔空间维度上就是亚洲内陆的核心,文化人类学“中心与边缘”的视野在这一课题上也会发酵出许多新鲜认识。

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的几种模式

根据这些认识论基础,我们初步将“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归纳为八种模式。

一、西北朝鲜。西北朝鲜在西汉前期只有零星汉文化因素,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开设朝鲜四郡以后,以“乐浪汉墓”为代表的汉文化从整体上取代了土著文化。从考古学文化、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族群结构、风俗习尚和行政设置等背景因素分析,辽东郡与乐浪郡关系极为密切。西北朝鲜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发展线索和历史进程与辽东地区大致同步,西北朝鲜的汉文化是伴随着辽东地区发展的历史节奏和历史内容而形成的,开设朝鲜四郡是西汉政府经略燕辽地区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因此称为“汉文化形成的伴生类型”。

二、辽西辽东。至迟在战国中期,燕国已占据辽西辽东地区。战国燕文化在基质上属于中原文化,但是燕僻在边陲,燕民中存在以貊人为主体的土著成分,被中原诸侯视为“燕貊邦”。战国燕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澳门土生葡人

①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 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综合研究之一》,《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

③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④ 参见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8~96页。

与葡萄牙母体文化的关系。西汉杨雄《方言》记载“燕代朝鲜洌水之间”是汉语的一个方言区,《史记·货殖列传》将“上谷至辽东”视为一个独立的人文地理单元。辽西辽东地区的西汉墓中普遍存在故燕文化因素,这一地区的西汉文化是在故燕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称为“汉文化形成的土生类型”。

三、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北方长城地带战国时期为秦、赵、燕三国北方边地,即《史记·匈奴列传》所谓“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林沄先生认为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最终形成是在战国中期,与游牧的北亚蒙古人种大批南下有关^①。汉匈关系是北方长城地带西汉时期历史背景的主线索,武帝以后西汉政府比较稳固地控制住这一地区。西汉王朝大量移民实边,“新秦中”成为内地移民的新家园。由于居民和田卒来自内地,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西汉墓的面貌与中原地区颇为相似。因此称为“汉文化形成的移民类型”。

四、河西河湟。西汉政府经略河西走廊的主要目的是“隔绝羌胡”,作为控制西域、出击匈奴的前出阵地和后勤基地。经略河湟谷地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控制西羌,屏障陇右。河西河湟地区缺乏广阔的经济腹地,设置郡县的初衷并非出自经济原因,河西四郡的人口和辖县数明显偏低。根据西汉政府经略这一地区的战略目的、较少的编户人口、完备的塞防体系、严密的军屯组织、复杂的民族结构、不同于北方边塞大部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与“绿洲耕牧型”或“山地耕牧型”较为接近),以及这种种历史背景在考古遗存上的表现,将此地区概括为“汉文化形成的军戍类型”。

五、四川盆地。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各自独立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大共同性,以船棺葬为代表的巴蜀文化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汉书·地理志》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显然先秦的巴蜀地区尚被视为西南夷地,而《史记·货殖列传》记述的西南夷已经不包括巴蜀之地。公元前316年秦举巴蜀以后,秦文化的强势介入先行削弱了巴蜀文化的根基,巴蜀文化在战国晚期早段已经逐渐转型。西汉初期巴蜀的汉文化,是在接续秦文化深刻影响和持续作用的历史背景下而形成的,秦文化为巴蜀文化迅速融入汉文化奠定了基础。因此称为“汉文化形成的续生类型”。

六、云贵高原。两汉政府完全掌控西南夷地区是一个渐进而缓慢的进程。在土著青铜文化最为发达的滇池地区,迟至西汉晚期才开始出现汉式陶器。西汉王朝在云贵高原实行羁縻统治,主要依靠当地的王侯君长进行治理。以羁縻方式进行统治有两个层面的原因。在策略层面,可以从封闭切割的地理环境、西南夷占主体的人口情况、分散性的社会结构、不均衡的社会发展状态以及当地居民丰富多样的生计模式等方面进行解释。在战略层面,与西汉帝国满足于西南贸易网络的畅通和丰厚资源的获取有关。我们将这种比较特殊的形态称为“汉文化形成的羁縻类型”。

七、岭南。南越国的政治制度、百官制度、宫寝制度、陵墓制度、度量衡等都以

^① 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年。

秦汉体制为基础，却有所变易。南越国统治阶层引领的南越国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越汉混合的新型越文化，这类族群集团可以称为“次生越人”（包括越化汉人）。“次生越人”与“比较纯粹的土著越人”、“受到汉文化一定影响的土著越人”共同构成南越国的族群基础。南越国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血缘和文化的交融大趋势，是“次生越人”的形成和发展壮大，“次生越人”是岭南汉族的最重要来源，因此称为“汉文化形成的次生类型”。

八、东南沿海。江浙一带西汉前期汉墓中的吴越文化因素一直相当强烈，武帝至成帝阶段甚至有增加的趋势。福建地区西汉时期汉文化的传播则主要集中在闽江流域，其他地区很少发现。吴春明先生指出，“华南越系土著民族文化与‘南岛语族’间是一个巨大的跨界民族文化共同体体系”。^①与西汉其他边远地区汉文化整体取代土著文化不同，在东南沿海地区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环太平洋文化底层”的文化因素得以积淀和延续，甚至发展起来，直至影响到今天的华南社会。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汉文化形成的涵化类型”。

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的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疆域和现实版图的形成过程，有着秦汉帝国大一统的深远影响。我们将中国历史边疆划分为既是历史过程（时间结构）又是空间结构的四个轮廓。“萌芽轮廓”是秦汉帝国形成以前的边疆，基本地域在春秋外围封国至战国诸侯开疆拓土的范围。秦并天下，疆域拓展至北方长城地带、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珠江地带。西汉至明清稳固控制的本土地域一般在此范围，大致介于中央政权边疆治理体系中直属体制与羁縻体制的过渡地带，称为“基础轮廓的内圈”。前清版图大致介于羁縻体制与藩属体制的过渡地带，除蒙古国外，基本在现今国界线内，称为“基础轮廓的外圈”。现今边界以外的一些地区，与中原政权曾经存在羁縻或者藩属甚至直属关系，或者与内附民族乃至中原政权保持较密切联系，而且现今国界内外的考古学文化往往构成某一整体，因此将这些地区称为“外延轮廓”，不能完全割裂出来。

我们注意到，以此八个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标志，串连起来的“辽海走廊”、“北方长城地带”、“藏彝走廊”和“珠江地带”构成了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而诸种形成模式的讨论则解释了这个“内圈”的建构过程。这些内容就是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历史意义。

原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0年12月号（总第311期）

^① 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与华南民族考古》，《东南考古研究》（第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论“西汉墓幽州分布区”

20世纪9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将史前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影响深远。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区块划分问题自然也引起学者思考。徐苹芳先生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不同,指出“在秦汉以后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墓葬(包括葬式和葬俗)的分区占有重要位置”^①,此点应当成为共识。

具体到汉代,俞伟超先生将西汉前期墓葬分为关中地区、三晋两周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汉、四川盆地、长沙和江淮)、山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北方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北中北部)和辽东地区计六区^②。王仲殊先生将秦汉时代的中国划分为关中和广义的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长城沿线和北方草原地带、以辽河流域为主的东北地区、岭南的珠江流域、川黔滇高原地区、甘青地区、新疆地区计九区^③,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依据汉墓材料。

1949年以来各地积累的汉墓资料已在万座以上,有待于系统整理,新的汉墓研究成果对于认识或者完善汉代考古学文化分区也许会有启发。笔者在研究辽东汉墓时注意到这一地区的西汉墓存在许多共性,确与许多地区殊相^④,所以俞伟超先生将辽东地区视为一个独立文化区,王仲殊先生将以辽河流域为主的东北地区视为一个独立文化区。我这里要补充的是,将辽东地区西汉墓与周邻地区比较,这一文化区的范围或还可以扩展,大体与汉代幽州行政范围中比较稳定的部分重合,可以暂称为“西汉墓幽州分布区”。

本文只是一个论纲。



辽东地区西汉墓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辽河以东的浑河、太子河流域和辽东半岛,大体属于燕汉辽东郡范围。其中浑河、太子河流域西汉墓的发现地点主要有辽阳市、沈阳市、抚顺县等地,辽东半岛西汉墓的主要发现地点有大连市、旅顺口区、金州区、

① 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7期。

② 转引自徐苹芳文。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秦汉考古”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④ 郑君雷:《中国东北地区汉墓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新金县等地,本文分别以辽阳地区和大连地区概称。

大连地区发表的西汉墓材料相当丰富,已经构成比较完整的演变序列,可以划分为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新莽三期。西汉前期有陶礼器墓和日用陶器墓两类陶器组合,均是承续战国燕墓传统,单室土圜墓。前者包括大连营城子 M19^①、大连大潘家 M3^②、新金花儿山 M1^③等墓例,陶礼器组合关系比较松散,零散出有鼎、盒、壶;后者包括旅顺牧羊城 M1^④、旅顺尹家村 M10^⑤等墓例,一般出有罐、盆、盘。西汉中后期包括新金花儿山 M7、新金马山墓^⑥、旅顺李家沟 M20(前后双室土圜墓)^⑦等墓例,夫妻合葬较普遍,陶器种类明显增加,出现簠、尊、簞、耳杯、魁、灯、薰、方炉等陶器和井、灶、猪俑、狗俑等模型明器。新莽前后有大连营城子 M1^⑧、营城子 M45^⑨、沙岗 M2^⑩等墓例,均为砖室墓,单室、木结构顶盖单室和前后双室附侧室等结构,夫妻合葬较普遍,开始随葬陶仓。大连地区西汉时期也有瓮棺葬(旅顺尹家村)。

参照大连地区陶器演变线索,辽阳地区汉墓期别亦可以划分为相应三期。西汉前期包括辽阳鹅房 LOM1^⑪等陶礼器和抚顺刘尔屯 M2^⑫等日用陶器墓,单室土圜墓,陶礼器墓组合一般为鼎、盒、壶,日用陶器墓出有罐、壶,亦有瓮棺葬(沈阳郑家洼子^⑬)。西汉中后期的刘尔屯 M3亦是单室土圜墓,出有罐、长颈瓶、簞,可能是夫妻合葬。新莽前后有辽阳唐户屯 M62^⑭(左右双室石槨墓)、上伯官屯 M2^⑮(单砖室墓)等墓例,出现丛葬,出有长颈瓶、瓶、奩、簞、耳杯、罐、盘、盆、瓮等陶器和仓、井、灶等模型明器。

大连和辽阳地区西汉墓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线索具有比较明显的共性,主要表现在西汉以土圜墓为主、新莽前后出现砖室墓、西汉中期出现夫妻合葬、西汉前期有两种陶器组合、若干陶器承续战国燕墓发展线索、主要陶器种类和形制相似、存在瓮棺葬等方面。虽然从现有材料看辽阳地区西汉中后期的陶器种类明显不如大连丰富(可能与墓例有关),但是已经可以确定,辽东汉墓的共性不仅局限于西汉前期。

① 于临祥:《营城子贝墓》,《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② 刘俊勇:《辽宁大连大潘家村西汉墓》,《考古》1995年第7期。

③ 旅顺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辽宁新金县花儿山汉代贝墓第一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④ [日]原田淑人:《牧羊城——南满洲老铁山麓汉及汉以前遗迹》,(日本)东亚考古学会,1931年。

⑤ 朝·中联合考古发掘队:《岗上·楼上》,(日本)六兴出版,1986年。

⑥ 新金文化馆:《辽宁新金县马山汉代贝墓》,《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⑦ 于临祥:《旅顺李家沟西汉贝墓》,《考古》1965年第3期。

⑧ [日]关东厅博物馆:《营城子——前牧城驿附近的汉代壁画砖墓》,(日本)东亚考古学会,1934年。

⑨ 于临祥:《营城子贝墓》,《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⑩ 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辽宁大连沙岗子发现两座东汉墓》,《考古》1991年第2期。

⑪ 李文信:《东北文物工作队一九五四年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

⑫ 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抚顺县刘尔屯西汉墓》,《考古》1983年第11期。

⑬ 朝·中联合考古发掘队:《岗上·楼上》,(日本)六兴出版,1986年。

⑭ 沈欣:《辽阳唐户屯一带的汉墓》,《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⑮ 佺俊岩:《沈阳上伯官汉墓清理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

二

辽西、京津唐地区西汉墓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线索与辽东地区西汉墓具有许多共性。

辽西地区西汉墓主要分布在热河山地的朝阳一带和辽西走廊的锦州附近,大体属于燕汉辽西郡的范围。朝阳地区西汉墓的主要发现地点有朝阳市、喀左县、凌源县等地,锦州地区主要发现于锦州市区。朝阳地区西汉前期单室土圜墓占绝大多数,亦有单室石椁墓(凌源安杖子^①M3)和瓮棺葬(喀左三台子^②M6),朝阳袁台子^③M119、喀左三台子M3等陶礼器墓零散出有鼎、盒、豆、壶等,袁台子M62、安杖子M4等日用陶器墓零散出有罐、盆、盘。西汉中后期包括袁台子M7、M11、M12等,前后双室土圜墓或单室石椁墓,鼎、豆等陶礼器绝迹,出有壶、盒、罐、盘等,出现陶尊、陶灶,有的随葬铁凿或铁镢。新莽前后的徐台子墓^④为单室石椁墓,随葬陶罐。锦州地区西汉前期均为单室土圜墓,国和街^⑤M3等陶礼器墓零散出有鼎、壶、盘、罐,国和街M1等日用陶器墓出有罐。西汉中后期包括中央马路M1、丰乐街M3^⑥等,多数为单室土圜墓,亦有单室石椁墓(中央马路M18),出现夫妻合葬,鼎、壶等陶礼器明显减少,出现簠、尊、釜、仓等陶器。

京津唐地区大体属于燕汉渔阳郡、广阳国的范围,发表汉墓数量很多,大体可以划分为以北京和以唐山为中心的两块。北京地区西汉墓主要发现地点有北京昌平、怀柔河北易县等地。易县东沈村^⑦、燕下都6号遗址^⑧、怀柔城北^⑨、昌平史家桥^⑩、白浮^⑪、半截塔^⑫等地均为土圜墓,新莽前后出现单室砖室墓(半截塔^⑬)。另外怀柔城北有瓮棺葬。北京地区西汉前期存在两种陶器组合,陶礼器墓随葬鼎、盒、壶、罐,日用陶器墓主要出有罐。鼎、壶等陶礼器比较发达,陶鼎、若干陶壶承续战国燕墓陶器发展线索,束颈陶壶是西汉一直存在的典型陶器。新莽前后出现耳杯、奩、薰、案、勺等陶器和仓、井、灶等模型明器,东汉前期鼎、壶等陶礼器消失。唐山地区西汉墓主要发现地点有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大厂县、天津宁河县等地。唐山贾各庄^⑭、大厂大坨

①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

② 金殿士:《辽宁省喀左县三台子乡发现西汉墓葬》,《文物》1960年第10期。

③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袁台子西汉墓1979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2期。

④ 田立坤:《朝阳十二台营子附近的汉墓》,《北方文物》1990年第3期。

⑤ 吴鹏、辛发、鲁宝林:《锦州国和街汉代贝墓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1期。

⑥ 刘谦:《辽宁锦州汉代贝壳墓》,《考古》1990年第8期。

⑦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64~1965年燕下都墓葬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11期。

⑧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燕下都“6”号遗址汉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0年第3期。

⑨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地》,《考古》1962年第5期。

⑩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史家桥汉墓发掘》,《考古》1963年第3期。

⑪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白浮村汉、唐、元墓葬发掘》,《考古》1963年第3期。

⑫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半截塔村东周和两汉墓》,《考古》1963年第3期。

⑬ 半截塔M1等墓简报认为是东汉墓,通过对北京地区汉墓的综合研究,时代应在新莽前后。

⑭ 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6册,1953年。

头^①、宁河田庄坨^②等地西汉墓均为土圜墓,新莽前后出现单室砖室墓(滦南小南庄^③)和石椁墓(唐山陡河水库^④),也有瓮棺葬(陡河水库)。西汉中后期存在两种陶器组合,陶礼器墓随葬鼎、盒、壶、罐等,日用陶器墓随葬罐、盆、盘等。新莽前后陶器有尊、罐、瓮、盆、盘等,其中盖罐是战国燕墓小口壶的遗型。

辽西和京津唐地区西汉墓亦以土圜墓为主,亦在新莽前后出现砖室墓,亦在西汉中后期出现夫妻合葬,西汉前期亦有两种陶器组合(唐山地区西汉前期材料缺乏,但是西汉中后期仍然存在两种陶器组合),西汉前期亦有承续战国燕墓发展线索的陶器,相应各期的主要陶器种类与辽东相似,若干陶器形制也与辽东相似(如“燕下都6号遗址”墓地和易县东沈村墓地的陶鼎),亦有瓮棺(在白云翔先生的统计中,京津唐和辽东是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分布最为密集的两个地区^⑤)。因此辽西、京津唐地区西汉墓可以与辽东地区西汉墓归入一个考古学文化区。

三

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两方面分析,辽东、辽西、京津唐地区西汉墓与周邻的长城地带、河北中南部、山东和乐浪汉墓有较明显的差别。

自河套平原穿过阴山山脉至燕山北麓的战国秦汉长城中段(包头、呼和浩特、集宁、张家口一线)大体属于西汉朔方和并州刺史部的北境,其中张家口地区西汉至东汉前期的主要墓地有河北阳原北关^⑥、阳原三汾沟^⑦、怀安耿家屯^⑧、万安北沙城^⑨等。长城地带从西汉至东汉前期一直存在土圜墓(山西朔县^⑩、浑源毕村^⑪、河北阳原北关、万安北沙城、内蒙古杭锦旗乌兰陶勒盖^⑫),同时横穴、竖井墓道、斜坡墓道等结构的土洞墓亦占有重要比例(朔县、阳原三汾沟、怀安耿家屯、内蒙古凉城北营子^⑬),约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期出现单室砖室墓(朔县)。

山东半岛和鲁南苏北大体属于西汉青州及兖州、徐州一部(山东半岛汉墓材料比

①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

② 邸明:《宁河县田庄坨汉墓》,《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③ 滦南县文管所:《滦南汉墓清理简报》,《文物春秋》1991年第4期。

④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山市陡河水库汉、唐、金、元、明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

⑤ 白云翔:《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

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北关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4期。

⑦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地区文化局:《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第1期。

⑧ 河北省文化局:《河北怀安耿家屯清理了两座西汉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⑨ [日]水野清一:《万安北沙城——蒙疆万安县北沙城及怀安汉墓》,(日本)东亚考古学会,1946年。

⑩ 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6期。

⑪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雁北行政公署文化局、大同市博物馆:《山西浑源毕村西汉木椁墓》,《文物》1980年第6期。

⑫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杭锦旗乌兰陶勒盖汉墓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

⑬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县北营子汉墓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